

(上接第3版)

包括在《巴颜喀拉山的孩子》里,我写那个老奶奶撒盐,高原上有些公路很陡,大雪封山的时候路上有雪是很危险的,她在那里转山,就随身带一些盐撒在路上,盐会让冰雪消融。她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信仰。你要知道,她用的不是我们网购,或从超市里买来的盐,这些盐是她花好几个月的时间赶着牦牛去盐区采回来的,采回来以后呢,一部分卖了换糌粑,一部分留着自已食用,就是这样,她还能省出两袋盐撒在路上,完全是为的后来人不翻车,好走路。像这样的做法,灵魂干净到这种程度,你能说不干净?

我觉得,《最后的农民工》,包括我写青岛的一些作品,是有理想主义气质吧,我可能是用受到青藏高原牧区精神感染的那种眼光来看很多东西,我看到的就是好的,我也希望自己写出那些闪光的东西,我也可以把人物写得完美无缺,我就是不服气,很多人总是把农民工写得那么肮脏。这部作品出来以后,真的有人评价说它不真实,就说农民都自私,怎么可以这样,我不争辩,因为我知道我的文学理念就跟很多人不一样,还有我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这种基于信仰的文化背景,加上草原牧区的那种自然地理,塑造了我的心理结构,就让我看任何东西都不一样,都更能看到好的一面,包括我看待都市,也是很多人都说都市怎么怎么不好,但我看到的更多是感动,有时就是有一点点东西,我都会被感动。

记者:你不带有色眼镜,没什么分别心,不先入为主,也就更能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但也有人认为文学就是要揭露假丑恶,你赞成这种说法吗?

杨志军:也不是不赞成,我是觉得文学,哪怕是批判现实主义最大的贡献,也不是批判,而是建树。比如雨果就建构一种最完美的人格,而所谓完美,不是说人不能有罪错,而是有了罪错就忏悔。托尔斯泰也是。所以批判是文学的其中一个功能,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可能因为多了批判性而更加深刻,但是这不是文学全部的功能,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建树。在这一点上,我可能和有些作家有不一样的考虑,我也不否定批判,但是我觉得那是一条腿,最好的作家都是用两条腿走路的。

3 写儿童小说,是因为我想很纯净地去表达一件事情

记者:你写儿童小说,是不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事?说实在的,刚听到你写这个有点吃惊,转念一想又觉得像你这样有着天真性情的人,就得写写儿童小说。

杨志军:最开始,我也没想过要写儿童小说。《藏獒》出版之后,有许多孩子端着这本书让我签名时,我还有点惶恐:孩子们也会喜欢我的书?后来听到一些反馈,也证实是有些孩子喜欢读。我有个朋友是儿童出版社社长,他也可能听到反馈吧,就非要让我写写看,我说写不了儿童小说,他说只要小说里面有小孩的角色就行,我想倒是可以试试,在他的鼓励督促下,我就写了《骆驼》,这部小说实际上是给逼出来的。我后来想想,写儿童小说也有理由,因为我发现我想很纯净地去表达一件事情,但成人世界是拒绝的,大家都老于世故,他们不想听天真的人谈什么,那一个作家偏偏有赤子之心,他想那样写,写儿童小说就是一个途径,后来又写了《海底隧道》。所以,当我有意识地写儿童小说,也就是想更干净、更纯粹地表达自己。但说实话,虽然一些人可能认为写儿童小说门槛低,我觉得难写。

记者:怎么难写?难写在哪?

杨志军:你看我写成人文学能一本接一本本地写,而且篇幅都不小,但儿童小说,我也就两三年才写一本,而且是薄薄的一本,我也不是说没有热情,而是写完一本以后,我就不知道往下得写什么,得怎么写了。因为你是成人,你却要用儿童的视角写,这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儿童是纯粹的,你得和儿童的这种纯粹有个对应吧。要是只是把自己假装成儿童,那就会显得很做作,达不到那种自然状态。另外一个难度就是写成人文学,在语言上可以放开写,但写儿童小说,用词量就很受限,只能用一些孩子能接受

的词,连成语都不能用。

记者:你的写作偏偏词汇量丰富,而且是饱含激情,你不必借儿童小说拓展市场,能以本心坚持写下去,还真是让人敬佩。

杨志军:所以写儿童小说,我一般写得很慢,只能一点一点往下写,写着写着就对自己很不满意,但都开了头了,又必须写下去,所以我写《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的时候,就写得很吃力,写完后回头看看也不是特别满意,就放了一段时间,放了一年多吧,都不敢拿出来。后来等写完《最后的农民工》之后,拿出来翻看一下,感觉还可以,就用两个月时间仔仔细细改了一遍,增加了一点东西,改完后再和编辑交流,如果他们说不行,我会一直放着。他们说好,觉得儿童能接受,会喜欢读,我就放心了。

记者:你的儿童小说都紧扣生态问题。

杨志军:对,像《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也是,我是有意识的吧,我想着再写一部关注生态的儿童小说,这样就构成一个三部曲。也是理想主义作怪,因为你把有些问题给大人说,他们也听不进去,那就给小孩说,让他们知道生态是怎么回事,所以还是想把这个主题饱满地表达一下。

记者:写生态和写风景虽然不是一回事,但要是写不好风景,大概很难写出好的生态小说。你的小说比较多写到自然风景,也大多写得挺好。不过相比你早年的小说,如《环湖崩溃》等,《雪山大地》里写景无疑更加出彩,体现在这部小说里,你可以说把自然和人文打通了,而且风景能反映人的情绪,也能营造小说氛围,基本上做到所谓的“景语皆情语”。

杨志军:可能是写作时间长了以后,写景能力也自然而然提高了吧。写

《环湖崩溃》的时候,我还年轻,可能写作思路特别流畅,一写起景色就收不住了,所以大片大片都是景物描写,顾不上写其他。到了后来,驾驭语言、驾驭场景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就提高了。

记者:你是生来就对自然有很强的感受力吗?还是会在阅读和写作中有意识地强化这种感受力?

杨志军:也没有强化,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吧,就是我喜欢大自然。到哪个地方,我都会先去看看周围的山山水水,我比较关注这些,从理性上讲,自然是文化的基础,所有的文化,都是由自然地理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大山大水塑造出来。青岛的海洋环境决定了它是这样的地貌,上海的山形地貌,也觉得它是现在看到的样子,所以文化都依赖于自然。那么从感性上讲,我又特别热爱自然,而且面对自然,想象有时候会很活跃,但它一出现,我也就忘掉了,只是写的时候会想起来,过去写过的东西是早就忘掉了。

记者:可有记笔记的习惯?

杨志军:没有。按说过去当记者应该有,但是我没有。我也不记笔记,我是觉得深刻的东西,就印在我们的脑子里,要是没有印在脑子里,说明这个东西没那么重要。那些印在脑子里的东西,你写的时候或许一下子就唤醒了。

记者:想必你脑子里还印着很多东西,等着你写的时候唤醒。

杨志军:我曾经说过,文学让人迷恋的原因之一,便是探索永无止境。作家就是那个穿珠子的人,他不断捡到珠子,把它们穿起来,直到再也捡不到或无力捡拾的时候。我想我还会探索下去,用一切我能得到的有意义的事件和人物,来发掘人性、道德和信仰对“人”的诠释作用。

《巴黎评论》| 露易丝·格丽克谈诗歌的艺术

2023年10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逝世。在逝世之前,她同被哈罗德·布鲁姆誉为“当代美国最好的诗人”的亨利·科尔进行了对话,对话如今发表在《巴黎评论》上。在对话中,科尔问格丽克,在她的作品主题从绝望走向超越时,神灵是否发挥了作用。她回答道,“神灵”通常在自己作品的上方,在黑暗的下方,是没有神性的人类。作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她不会使用“神灵”一词,但她确实认为,在作品的高处,是一种被某种方式拯救的感觉,而在底部,则是人类被遗弃的感觉。另外,她的作品也一直在两种模式之间转换,一种是在垂直轴上运行,即从绝望到超越;另一种则是水平移动,关注更多的社会或公共问题。通过这种转换,她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

《卫报》| 专访迈克尔·罗森

现年77岁的英国儿童作家迈克尔·罗森以“Nice”表情包在中国走红,而他本身其实是前任英国儿童桂冠作家,也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儿童文学教授,曾撰写或参与编写了两百多本书籍。今年,他又获得了英国文学奖笔会·品特奖。在采访中,他分享了为孩子写作的禁忌:“不要随心所欲地描述不属于故事情节的任何事情。作为成年人,我们喜



欢这样做,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描绘地点和空间,用于在其中放置角色。但是,孩子们会对此感到生气。另一件你永远不能忽视的事情是,在儿童读物中,孩子必须是中心。你不能把故事的精华从孩子身上夺走,要让孩子永远处于读者的视线范围内。”

《出版家周刊》| 自出版作者如何制作封面

自出版作者最容易受到的批评之一,就是他们的书籍设计不专业、封面造型不佳。然而,今天的作者有很多选择,可以让自己的书籍拥有像任何传统出版的书籍一样专业的封面。同时,自行出版书籍的好处之一,就是作者自己能够制作封面,而不是把封面的决定权交到

一月世界文学期刊动态

张熠如

出版社手中。对Lambda文学奖得主、作家桑塞弗拉·劳里来说,自出版的乐趣之一就是有机会聘请一些喜欢的艺术家,为她的书籍封面创作原创艺术。自出版作家可以直接联系欣赏的艺术家,也可以在Fiverr等网站上找到专门从事封面设计工作的独立艺术家,进行封面布局和格式化。另外,作者也可以查看其他自出版书籍的致谢页面,看看它们是否列出了封面设计师。

《法国世界报》| 安·斯科特新作推出

凭其关于孤独与新生的内省小说《无耻者》,法国作家安·斯科特获得了最新一届雷诺多文学奖。雷诺多奖由十位等待龚古尔奖结果的记者创立,通常被视为龚古尔奖的补充,是法国最富盛名的文学奖之



一。安·斯科特出生于1965年,因其描绘当代青年肖像的小说而被视为社会现实主义者,对亚文化人群的描绘十分精湛。她的第二部小说《超级巨星》使她在法国享有盛誉。此外,她也是音乐人和法国知名时装模特。《无耻者》既是喜剧又是悲剧,它揭露了巴黎创意人士、格格不入的人和局外人之间起起落落的友谊。安·斯科特认为,《无耻者》绝不是一本关于资产阶级波西米亚巴黎人搬到乡村“自己做面包或养山羊”的书,相反,它讨论了人应该如何独处。

Lithub网站 | 致谢的意义

在阅读时,很多读者都会遗漏作者的致谢部分,然而,在致谢部分,读者可以找到有趣的作家花絮。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判决》中,露易丝·厄德里奇用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感谢她在高中作文比赛中获得的一本字典;布克奖得主马龙·詹姆斯也在致谢中提到,他不会让他的母亲读《黑豹,红狼》中的某两页。致谢也可以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气质——有时它与叙述者的气质完全不同。幽默作家的致谢可能很严肃,写作时漫无边际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其致谢却一板一眼、非常切题。另外,当作家感谢那些他们素未谋面、却给予他们启发的前辈作家时,往往令人感动。比如,在阿莉·史密斯的《秋天》中,她提到了1964年Vogu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像是一位作家“通过电话线与另一位作家交谈”。